

《百年潮》精品系列

文坛与文人

主编 杨天石 本卷主编 杨天石

斯坦因怎样骗盗了敦煌文物……五四精神和激进主义……我所了解的《大公报》——纪念《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周扬谈鲁迅和三十年代文艺问题……萧军轶事……回忆乃超同志……丁玲、陈明融合在一起的生命……我的父亲朱自清……我所了解的新建设……“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胡耀邦对两次文艺风波的关注……1981年批判《苦恋》的前前后后……关于七律《有所思》的通信……胡乔木请钱锺书改诗种种……几番风雨忆周扬……回忆周扬为《邓拓文集》写序……楼适夷与周扬关于冯雪峰通信……虽不同生 亦当共死——忆苏灵扬与周扬……郭沫若与吴晗的诚挚交往……刘大年忆郭沫若……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和安娜的四次见面……梁漱溟1958年向党交心……恋情与理性——读徐芳给胡适的信……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闻一多的婚姻和爱情……父亲晚年的两件大事……被鲁迅“痛斥”之后的徐懋庸……胡风的私人通信如何成了罪证……胡风致乔冠华函……要开作一支白色花——记阿垅……消耗生命的记录——关于赵丹的狱中交代……理解先驱——读华岗早期著作有感……范文澜的“史谏”……历史家的品格——记黎澍师……送李新先生远行……故人长忆亦长铭——纪念郑惠

WENTAN YU WENREN

上海辞书出版社

任仲夷 袁宝华 张劲夫 萧克 胡绳 程思远 宋任穷 薄一波

天地，为公众提供好读物（程思远）既要谨严务实，又要活泼轻松。为百年潮二周年书（胡绳）为《百年潮》双月为百年潮杂志题（袁宝华）《百年潮》创刊四周年纪念：真，实，是。（任仲夷）《百年潮》出版两年以来，编辑部的各位同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刊物办得越来越好。为我国学术界做出更大的更有意义的贡献。（季羨林）腐，拥抱革新。鉴彰昨日，律验如今，学由以立，国由以兴。历历贤哲，巍巍人民，各位其位，各能其能。匪岂容诘。写实要实，写真要真，此事难全，端在力争。（刘大年）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直笔写青史，再现百年潮。书赠《百年潮》并以共勉（章开沅）贺《百年潮》改为月刊 百年尘埃浪淘尽 重世乘（狭间直树）向世界展示中国现代历史的优秀窗口（麦金农）

上海辞书出版社

《百年潮》精品系列

文坛与文人

主编 杨天石 本卷主编 杨天石

WENTAN YU WENREN

BAINIANCHAO JINGPIN XILIE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坛与文人/杨天石主编.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12

(《百年潮》精品系列)

ISBN 7-5326-1942-7

I. 文... II. 杨... III. 文化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K26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5811 号

监 制: 张晓敏

统 筹: 唐克敏

责任编辑: 解永健

装帧设计: 姜 明 明 婕

《百年潮》精品系列

文坛与文人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www.ewen.cc www.cihai.com.cn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3.25 插页 2 字数 313 000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 000

ISBN 7-5326-1942-7/K · 319

定价: 32.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512—52219025

《〈百年潮〉精品系列》序

龚育之

《百年潮》出精品系列,编者邀我作序,说:“你与《百年潮》有三重关系:既是读者,又是作者,还是主办单位的负责人。所以,这篇序,你非写不可。”我答:“说‘读者’,我的确每期都读;说‘作者’,我有时偶尔也作。只是‘主办单位负责人’一说,不能认同。我虽是中共党史学会这一届的‘负责人’,对主办《百年潮》却没有‘负’起‘责’来。何况中共党史学会就要换届,我这个会长也不再当了。”不过,作为经常的读者和偶尔的作者,写序之请也不可辞。

写点什么呢?就写写创办和支撑这个刊物尽心尽力最大的三个人,不妨称之为《百年潮》创业的“三君子”吧。

第一位“君子”是胡绳。办这个刊物,他是创意者。他是我的老领导。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他任中宣部科学处长时,我就曾在他手下任干事;四十年后,他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兼中共党史学会会长时,我又是他的副手,任常务副主任兼常务副会长。胡绳久患癌症并多处转移,终于没能活过二十世纪的最后一道门槛。送别胡绳归来,我写过几则琐忆,在《百年潮》上连载,记述几十年中我对胡绳的印象和同胡绳的交往。此文已经选入这部精品系列,这里就不细说了。单说《百年潮》的创办。

胡绳认为,党史研究成果主要在党史界内阅读、流转,这种“体内循环”的情况应当改变。走出专业人员的阅读圈子,到更广大的群众中去寻求读者,应当是党史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除了办好党史研究的学术刊物以外,他还希望办一个通俗的、可读性强的讲党史、革命史、近现代史的刊物。

胡绳是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在中国的先驱。三十年代他和艾思奇等同志,就写了影响甚广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哲学读物。四十年代他写的《二千年间》和《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既是开拓性的学术著作又具很强的通俗性,是影响甚广的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史学读物。现在,身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又建议办中国近百余年历史的通俗刊物,这展现出他作为一位史学大家的宽阔眼界、超出纯粹学术研究的眼界。我们在党史室和党史学会工作的同志都很赞成这个建议。于是,就有了《百年潮》。

说“于是就有了……”，说得轻松，做起来就不那么轻松了。把一个好的创意付之实践，组织班子、约集稿件、编成刊物，并且坚持下来，是一件艰难而辛苦的事情。担负起创办《百年潮》重任的，是郑惠。这是我这篇序言里要说的第二个人——第二位“君子”。

郑惠是我从高中时代起就相识相交的老同学、老同事。一九九四年他从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担任了党史学会的副会长，用习惯的说法是到了“二线”。他熟悉党史，又熟悉编辑工作。曾经参与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参与主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编写，参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编写，参与主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编写和《胡乔木文集》、《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的编辑。五六十年代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工作过，到了党史室，又先后主编过《党史通讯》和《中共党史研究》。退到二线，还想为党史事业发挥“余热”。创办《百年潮》的建议一出，郑惠自告奋勇，承担重任，大家也都认为他是适当人选，赞成和支持他当这个新办刊物的社长。说是支持，基本上限于精神层面。从筹备到出刊，自筹资金（没有财政拨款），自配人员（单位只给两个定编人员），自办发行（不可能用行政命令摊派），郑惠实实在在是操尽了心，费尽了力。最难的还是组织稿件。刊物要办出品位、办出水准，关键是稿件的质量。郑惠交游广，信息灵，思路宽阔，眼光敏锐，不但提出选题，介绍关系，布置编辑四处组稿，而且亲自登门约稿，笑嘻嘻地同你谈，跟你磨，不拿到稿子决不罢休，不少稿子还亲自动手编辑和修改。《百年潮》一出世，就显得很有生气，很有看头，在史学界和热心读史的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好评。

一九九九年党史学会换届，郑惠年逾七十，不再任副会长也不再任《百年潮》社长了，还是很关心《百年潮》的工作，并已开始《胡绳传》写作的准备。没有想到，二〇〇三年春天，郑惠在完成《程门立雪忆胡绳》一书之后，也因癌症逝世。我在《百年潮》上写了一篇文章：《故人长忆亦长磋》，记述从高中同学以来，五十八年中我和他的友谊，也已收入这部精品系列了。其中说道：“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郑惠，所做的最有影响、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就是创办《百年潮》。郑惠为这个刊物，真可谓呕心沥血，在学界赢得了声誉。而誉之所在，毁必随

之。我写的几篇回忆文章《毛泽东与傅鹰》、《几番风雨忆周扬》、《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都送给《百年潮》发表,我对郑惠这项事业的支持,也就止于此了。”这是我对郑惠的记念,也是我对郑惠的歉意。

我这篇序言里要说的第三个人——第三位“君子”,是杨天石。郑惠为创办《百年潮》,罗致人才,请到了杨天石。郑为社长,杨为主编,好一对搭档。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专家,还是中央文史馆的馆员。他所写的关于中山舰事件的一篇学术论文,得到乔木很高的赞扬,这我是听说了的。但一直无缘谋面。他出任《百年潮》主编的时候,我和他还不相识。第一次同他见面,已是郑惠不再当社长以后,请杨天石继续当主编的一次会议上。这之后才有了交往,也并不密切,所谓“淡如水”吧。他在大学里学的是中国文学,长期从事的是历史研究。他送给我他的著作:《海外访史录》、《横生斜长集》、《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关于蒋氏的一书,从海外到海内曾经激起一阵波澜。杨为批驳海外奇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百年潮》未能刊出,在《博览群书》和《炎黄春秋》上发表了。听说,有关方面对此书有了客观而平实的评价,才没有酿成什么事件。办《百年潮》对他来说属于兼职,他兼而尽职,兼而敬业,在从事本职工作的同时,对杂志倾注了很多心血。人事有更替,事业多磨砺,杨始终如一,坚守岗位,杂志办到今天,杨是功不可没的。

胡绳、郑惠、杨天石三“君子”,还有其他先后参与刊物工作的同志们共同努力,成就了一番《百年潮》的事业。

《百年潮》创刊,提出了八个字:“信史,实学,新知,美文”,我很欣赏。史要信,要真,要言之有据,不可信口雌黄;学要实,要下功夫,要言之有物,不可浮泛虚玄;知要新,无论在史料方面,或是在观点方面,都要有新的发掘和开拓,不可把众所周知当鲜为人知;文要美,倒不是辞藻要如何华丽,而是谋篇布局、遣词造句都要考究,不可马虎潦草。《百年潮》赢得声誉,恐怕就在这“信史,实学,新知,美文”八个字的追求上吧。至于对一个刊物有称赞,有批评,本不足奇。学术是在争鸣中发展的。一九五三年毛泽东最初提出百家争鸣,针对的就是中

国历史分期方面的不同学术见解。争鸣应该本着善意的态度,相互切磋,平等交流,而不是武断地乱扣帽子。争鸣应该开诚布公,而不是暗箭伤人。当然,作为一家刊物,不应讳疾忌医,而应从善如流,改进工作,提高质量,办得为读者更加喜欢,更加满意。

《百年潮》取名“百年”,实际上中国近代历史从反鸦片战争算起至今已有一百六十多年,现代历史从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则是八十多年,当代历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算起也已五十多年,这个历史过程还在延续。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一百六十多年是变化最快也最深刻的,也是最值得梳理、总结和反思的。历史经验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都应该总结和反思,都是值得珍视的宝贵遗产。学习和总结历史,以观察和规划当前,古有明训。从我们党的历史来说,每一个重大的新局面,不都是从清理历史问题着手而开启的吗?新民主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都是在对历史总结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吗?中国特点的民主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都是借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开辟出来的吗?

《百年潮》从一九九七年开办,筚路蓝缕,十分不易。党史国史不易把握,这是编辑业务的困难;报刊市场竞争激烈,这是发行销售的困难;人员经费捉襟见肘,这是经营管理的困难。《百年潮》的同志们在困难中坚持,到现在已近九年。精品系列九卷十二本,选取的就是创刊以来发表的一部分作品。所谓“精品”,当然是在编者看来的属于或近于“信、实、新、美”之作。其实并不见得都是如此,读者见仁见智,会有自己的判断。这也是可以争鸣的。不过,无论如何,把从创刊以来的文章,挑选、整理、编辑成九卷精品系列,编者是花费了工夫的。可以说是《百年潮》创业的一道轨迹、一个印痕。这是不是也算对《百年潮》自己的历史做一个总结呢?

二〇〇五年七月

目 录

《〈百年潮〉精品系列》序	龚育之	1
斯坦因怎样骗盗了敦煌文物	宁 可	1
五四精神和激进主义	王元化	12
我所了解的《大公报》——纪念《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	张颂甲	16
周扬谈鲁迅和三十年代文艺问题	陈漱渝	27
萧军轶事	张毓茂	38
回忆乃超同志	张光年	47
丁玲、陈明融合在一起的生命	李向东	51
我的父亲朱自清	朱乔森	63
我所了解的《新建设》	吉伟青	88
“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	林默涵	98
胡耀邦对两次文艺风波的关注	徐庆全	106
1981 年批判《苦恋》的前前后后		
张光年日记选	张光年	114
唐达成访谈录	丁 东	130
关于七律《有所思》的通信	胡乔木 钱钟书	134

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	李慎之	139
几番风雨忆周扬	龚育之	143
回忆周扬为《邓拓文集》写序	徐宗勉	176
楼适夷与周扬关于冯雪峰的通信	徐庆全	180
虽不同生 亦当共死——忆苏灵扬与周扬	荣天屿	190
郭沫若与吴晗的诚挚交往	苏双碧	197
刘大年忆郭沫若	刘 潞	204
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和安娜的四次见面	王廷芳	217
梁漱溟 1958 年向党交心	汪东林	228
恋情与理性——读徐芳给胡适的信	耿云志	244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季羨林	249
闻一多的婚姻和爱情	李 凌	258
父亲晚年的两件大事	章含之	271
被鲁迅“痛斥”之后的徐懋庸	白 岩	275
胡风的私人通信如何成了罪证	晓 风	280
胡风致乔冠华函	徐庆全	291
要开作一支白色花——记阿垅	晓 风	298
消耗生命的记录——关于赵丹的狱中交代	李 辉	310

理解先驱——读华岗早期著作有感	丁伟志	317
范文澜的“史谏”	李 新	326
历史家的品格——记黎澍师	陈铁健	329
送李新先生远行	陈铁健	343
故人长忆亦长磋——纪念郑惠	龚育之	353
《〈百年潮〉精品系列》编后话	杨天石	361

斯坦因怎样骗盗了敦煌文物

宁 可

近 100 年前的 20 世纪初始,当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直逼北京的 1900 年旧历 5 月,遥远的甘肃省最西隅的敦煌县,也发生了一件后来震惊世界的大事,那就是封闭了 800 余年,藏有 5 世纪到 11 世纪的古文书 5 万余件、绘画 1 000 余件的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

然而,这个重大发现在当时却悄然无声,鲜为人知,直到 1907 年,一个外国学者从这里骗盗了数千件文书、绘画,运到英国,这才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

这个外国人,就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

这次骗盗的经过,在最近翻译出版的斯坦因著的 5 大卷《西域考古记》里,有他自己的得意非常的详细记述。

1907 年 5 月下旬的一个炎热的白天,敦煌县东南的莫高窟(又名千佛洞)的一座石窟中,一星微弱的灯光在摇曳。四野荒凉,寂静无人,只有风儿吹过鸣沙山激起沙粒的阵阵响声。

“随我来。”持烛的中年道士低声说。他个头不高,浓浓的眉毛,

神情诡秘紧张。他就是莫高窟一座道观里主持香火的王圆篆,身后是一个鹰钩鼻子、眼睛深凹的矮个结实的洋人,这就是匈牙利人(后入英国籍)马克·奥雷尔·斯坦因,著名的东方学家和考古学家。旁边还有一个斯坦因雇佣的被称为蒋师爷的中国助手蒋孝琬。王道士带领他俩沿着一座石窟甬道的北壁进到用砖封闭的密室门口,悄声说道:“进去看看吧。”那砖已被王道士扒开了。斯坦因站在门口,借助烛光向昏暗的密室望去,啊,那一丈见方,六尺多高的狭小石窟里,一束束的古代文书成捆成捆地从地上一直摆到顶上,足足有几万件,室内只剩有可容两个人立足的空间了。面对如此丰富的文化宝藏,珍稀的无价之宝,斯坦因不禁目瞪口呆。



斯坦因像

斯坦因是王道士准许的第一个进入密室的外国人,也是第一个从王道士那里骗取了大

量敦煌文物的外国人。这个密室和文物是王道士发现的,他认为,是神佛的旨意要他看守这些经卷,所以,他守口如瓶,秘不示人。但是,他又怎么会给一个外国人大开方便之门呢?斯坦因耍了哪些花招赢得王道士的信任呢?这得从王道士发现莫高窟藏经洞说起。首先,还得说说莫高窟开窟造像的由来。

莫高窟坐落在地处古代丝绸之路要冲的城市敦煌东南 25 公里鸣沙山的崖壁上,自公元 366 年(前秦建元二年)起,历代的佛教徒们不断在这里开窟造像,此地便逐渐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佛教圣地。第一个开窟造像的是僧人乐僔。

公元 366 年的一天,他在敦煌城郊散步时,无意间走到了鸣沙山东麓,忽见山顶空中一片金光灿烂,似有千万尊佛在金光中显现。啊!这不是佛祖显灵吗?看来,这里是一方圣地呀!于是,他招募工匠在鸣沙山东麓的崖壁上开凿了第一个石窟,这就是莫高窟建窟之始。其实,乐僔哪里知道,那金光同佛像,只不过是大气中光线的折射作用所形成的自然现象,如同海市蜃楼的现象一般。这种充满佛教色彩的说法传开以后,不久有个禅僧法良在乐僔所开的石窟旁边又开了一窟。此后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回鹘、西夏、元等一千年十几个时代的佛教徒不断开凿,在一千六百多米长的断崖上,形成了上中下几层似蜂房般的石窟群。至今,其中的 492 个洞窟中,存有三千多身彩塑,四万五千多平方米的壁画,还有五座唐宋木构窟檐,是我国古代一座瑰丽宏伟的艺术殿堂,举世无双。但是宋元以后,由于丝绸之路的没落和战乱等其他一些原因,这里的佛教日趋衰落,莫高窟也逐渐湮

没无闻。

至于藏经洞,那是在 11 世纪封闭的。为什么放置了那么多东西又加以封闭,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只好推测。一说是为了防备战乱。一说是放置废弃不用的物品。不管怎样,藏经洞的门被砌上了,并在窟口绘上了壁画,丝毫不露痕迹,不久就被人遗忘了。这一遗忘,就是八百



斯坦因(中坐者)在第二次中亚考察途中,左坐者为蒋师爷

多年。这也许是幸事。当藏经洞的小门被王道士发现打开时,洞内的大批文书绘画已经是极为珍贵的国之瑰宝了。

王道士原来是个当兵的,退役以后出家当了道士,四方化缘度日。来到敦煌以后,在莫高窟定居下来。莫高窟虽说是佛教洞窟,但在重修的洞窟中,有些已增添了道教的内容,何况民间对佛道不大区分,常常一起供奉,所以王道士在佛教石窟中建立道观,人们认为很平常,还不断有人请他做道场、礼忏、祈福,香火日盛。王道士是个虔诚的信徒,他化缘的钱财不少,自己却过着俭朴的生活,一心一意要按照道教的规格重修和改造他所掌握的那些洞窟。首先是雇人清除洞里的积沙。

藏经洞是怎样发现的,有一些大同小异的说法,其中的一个是这样的:

1900年旧历5月26日清沙工作进行当中,人们发现现在编号为第16窟的甬道北壁墙上有一条裂缝。休息的时候,一个姓杨的雇工用芨芨草点燃旱烟袋以后,顺手将芨芨草插到身后的那条裂缝里。谁知越插越深,插不到底。杨某用手敲敲洞壁,听声音里面好像是空的。杨某告诉了王道士。当天晚上,王道士便和杨某沿着裂缝,去除了第16窟封闭处的封泥,打开了洞口,发现里面原来还有一个小窟,举世瞩目的敦煌藏经洞(现在编号为17窟)就这样被发现了。王道士并不知道所藏文物的真正价值,但他意识到是稀世珍宝,便请敦煌城内的官绅前来参观,企图引起对莫高窟的重视,以便获得更多的钱财重修石窟。但是,无人识货。直到1903年金石学家叶昌炽(时任甘肃学台)见到了藏经洞里的几件文物,包括拓片、绢画和写本经卷,认为,这是一批极有学术价值的古物,建议将藏经洞的全部文物运到省城兰州保存,估计运费需要五六千两银子。但是当时,入侵北京的八国联军已经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逼令清政府付出巨额战争赔款四亿五千万银两。这笔赔款分摊到各省的头上。甘肃省正忙于聚敛赔款,对保存珍贵遗物不屑一顾,只是责成王道士将藏经洞再次封存起来。清朝政府不予重视,对这批文物的命运听之任之。可是,对掠夺我国古代文物极感兴趣的外国探险家、考古学家,在本国政府的支持或资助下却接踵而来了。

斯坦因是在他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察时,循着古代楼兰通向东方的道路来到敦煌的。在此之前,匈牙利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齐曾随塞钦伊考察队于1879年游览了莫高窟。1902年,斯坦因参加了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东方学者会议,听到洛克齐介绍莫高窟精美的壁画

和塑像。洛克齐还认为,它们中的一部分与早期印度艺术有紧密联系。他的发现和思路深深吸引了斯坦因。这也是斯坦因把他的调查范围向东延伸到敦煌的原因。

因此,当斯坦因1907年3月10日到22日在敦煌县城停留的10天里,尽管“由于有多种任务而一直十分忙碌”,但仍在3月16日那天跑到敦煌城东南25公里的莫高窟,来考察因千佛洞而闻名的佛教石窟寺。

匆匆的考察让他意识到莫高窟“对研究中国佛教绘画和雕塑艺术是一笔极丰富的财富”。他深感他的设备“对于完成这重要任务来说是何等欠缺”,不能像他对新疆古代遗址那样动手发掘,而只能限于记录和拍照,但他“已意识到保护所能记录下来的这批艺术财产的重要性”,而这需要延长他在敦煌停留的时间。

但促使斯坦因延长他在敦煌停留时间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从一个被流放到敦煌的乌鲁木齐商人扎希德伯克处听来一个绝非空穴来风的重大传闻,莫高窟“藏经洞里偶尔发现了大批古文写卷”,“这批无价之宝据称当时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一个道士负责看管”。这激起了斯坦因极大的渴望,因此无视中国主权和政府禁令,和蒋师爷一起“作了周密审慎的计划,准备用最为妥善的办法去获取这些写卷”。

不巧,这时王道士带着他的两个助手出外化缘去了,两个月后才能回来。斯坦因感到这时将他的盗取计划“付诸实施显然是不明智的”。但蒋师爷还是从帮助看守道观的一个小喇嘛那里套出一些藏经洞的位置和发现、封存的有关内情。小喇嘛还提到他外出化缘的师傅从王道士手里借了一个卷子。蒋师爷说服那个小喇嘛把卷子从师傅房里拿出来看看。这是一卷汉文佛经,长14米多,高25厘米,纸色淡黄,纸质坚韧,看上去很新,字迹清晰,书法秀美。对这个卷子初步鉴定以后,斯坦因认为密室所藏写卷主要应是佛经。在中国,书籍装帧成册多是宋以后的事,更早的多是卷子形式,因此“可以断定它的时代应当是很久远的”。这样,商人扎希德伯克的传闻得到了确证。

“一大批古代写卷等待着去被发现的念头”,“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斯坦因重返千佛洞。从3月23日起,斯坦因对敦煌地区的古代长城烽燧遗址进行了考查、采集和发掘,获得了大量文物,特别是汉代木简。两个月以后的5月21日,斯坦因重返莫高窟,把帐篷扎在窟前,“准备将早已拟好的计划付诸实施”。

由于敦煌是汉人聚居地区,不像新疆荒漠中的废墟那样杳无人烟,可以肆意而为;莫高窟又是“当地人朝拜的一个圣地”,“容不得有任何粗鲁的举动”;再加上蒋师爷收集到的有关看守藏经洞的王道士的性格和举止的情况,就更使斯坦因“感到有必要在开始时应采取审慎、缓慢的行动”。

令斯坦因满意的是,这时莫高窟已过了朝圣的节日,除了王道士和他的两个助手,以及一个地位低又不懂汉文的小喇嘛之外,“整个遗址别无他人,一片荒凉,仿佛是一个被人们忘却了的地方”,有利于遂行他的盗取计划。但是跟王道士见面,斯坦因就感到他“是一个不好对付的人”,“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神情,令人难以捉摸”,看样子必须谨慎从事小心对付。斯坦因为了不使王道士看出他的真实意图,采取了声东击西的战术。第二天,他考查了几个主要洞窟,并对一些壁画拍照,“以此来掩饰此行的主要目的”。当他路过藏经洞门口时,看到洞口已被砖头封闭了。这是为什么?难道想看看藏经洞里的经卷堆放情况落空了吗?斯坦因有些不安。他让蒋师爷向王道士请求进洞,王道士说什么也不同意。后来蒋师爷提出捐一笔钱给王道士修缮庙宇,王道士这才说出封闭洞口的目的只是为了不让众多的香客挤进去,他答应在加上许多限制的情况下,给斯坦因看几份藏经洞的卷子,可是不同意他们去看全部经卷,显然对他们心存疑虑。尤其是蒋师爷急于拿到一两个卷子的要求使王道士心烦,怎么办?斯坦因担心他的“全盘计划一下子面临告吹的危险”。

他琢磨,王道士是个虔诚的教徒,光用钱不能买通,还要投其所好。王道士最大的愿望是修缮庙宇。几年来,他将化缘得来的钱都用在重修洞窟了,这也是他的精神寄托的所在。斯坦因故意提出,要参观王道士经手修缮的洞窟和塑像,这一招果然很灵,王道士欣然同意。他带领斯坦因和蒋师爷穿过新修的庙宇前廊和高大的殿堂,欣赏了增补的泥像和壁画。虽然比起其他旧有的塑像和壁画粗俗拙笨,逊色很多,斯坦因还是搜刮肚子里的所有美好之词来形容,并且大肆夸奖王道士在一片废墟和流沙淤积的石壁上重修庙宇的艰辛和卓著功勋,而对于自己魂牵梦萦的藏经洞却绝口不提。

通过与王道士的接触,斯坦因还了解到,他是个虔诚、愚昧、迷信而又相当顽固的人。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知之甚少,用不着同他谈论考古学之类的东西,但是可以同他谈论玄奘。玄

奘是唐朝经过千难万险赴印度取经的高僧,在中国可说是家喻户晓。他是王道士心目中的偶像,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这样,斯坦因又使出了第二招来博取王道士的信任。他用半通不通的汉语向王道士讲述自己如何崇拜玄奘,又如何从印度追随他的足迹,跋涉万里,越过高山和荒漠,寻访了玄奘的遗迹,朝拜了玄奘朝拜过的寺院……

斯坦因滔滔不绝地说着,蒋师爷时不时地在一旁敲边鼓。王道士听着听着渐渐入了迷,眼睛开始发亮。他热情地带领他们走到大殿外面一条新修的长廊上,不无得意地指着那些描绘玄奘西行故事的绘画,说明都是自己雇请当地的画匠来画的,并且讲述绘画的内容。有的是玄奘降服了吞食了他的马匹的一条龙,迫使它吐了出来;有的是他的徒弟们将他从妖怪手中救了出来。尽管这些故事都是神话传说,带有迷信色彩,斯坦因还是假装津津有味地听着。只有一幅画在斯坦因看来对他是个好兆头,那是玄奘站在一条激流的岸边,他的马满载着经卷站在身旁。一只巨龟向他游来,准备驮他过河。很显然,这画的是玄奘运载着 20 捆佛经从印度归国时遭遇千难万险的情景,尽管其中也掺杂了传说的成分。斯坦因企盼王道士能从这幅画里得到启发,允许他将古代经卷重又运回印度老家。斯坦因来中国考古正是受了英印政府的派遣和资助的。那时,印度还是英帝国的一个殖民地。斯坦因决定先不暴露自己的真实意图,等待时机成熟。他留下蒋师爷,让他去催要王道士答应借的经卷。但是王道士只是一味敷衍,并不拿出来。斯坦因“除了等待,别无办法”。

可是到了深夜,蒋师爷悄悄走进斯坦因在莫高窟旁搭的帐篷,喜洋洋地抱着一小捆经卷,这是王道士答应给他们看的第一批经卷,是他藏在大黑袍子底下刚刚给蒋师爷送去的。看样子,那手写的经卷古色古香,同在小喇嘛那里看到的差不多,可能也是佛经。为了弄清楚上面究竟写的什么,蒋师爷又悄悄溜回石窟里的一间小屋,连夜翻阅。第二天一早,蒋师爷带着激动和喜悦的神情过来告诉斯坦因,那是经玄奘亲手翻译的他从印度带回的佛经,经卷边上有玄奘的名字。斯坦因立刻感到他的好运气来了!他们充分利用王道士的宗教迷信,将王道士无意中抽出的玄奘翻译的经卷,说成是神的旨意。蒋师爷对王道士说,正是唐僧在天之灵将密室藏经托付给王道士,以等待唐僧的忠实信徒斯坦因从印度到来。王道士随手拿出唐僧翻译的经卷,正是上天催促他将密室藏经立即展示给斯坦因的表示。蒋师爷的一番鬼话,哄骗得王道士信以为真,他走到密室门口,开始拆除堵门的砖块。几个小时以

后,斯坦因进入了 he 梦寐以求的藏经洞。这就是本文开头所写的那一幕。

斯坦因看到堆积如山的经卷藏在狭小的密室里,两个人在里面就转不开身,更别说在那儿翻阅了。如果将藏经统统搬到外面宽敞的殿堂去,查看起来就方便了,但是王道士担心,万一被前来烧香礼拜的人撞见,便会有流言蜚语传播开来,说是王道士不把经卷好好收藏,反而让外国人拿去乱翻,亵渎了神圣的佛经,那王道士在施主和香客们中的好名声就全完了。所以,王道士坚持由他亲自取出经卷,每次一捆,送到密室附近的一间封闭得相当严实的小屋里,斯坦因和蒋师爷在那儿翻检阅读,便不会被人发现了。斯坦因很清楚,几万件的文书,还夹杂着纸画、布画、帛画、刺绣等等,看上几年也看不完啊!他来不及细看,只能尽快地挑出他认为有重大价值的文物堆放一边,以便设法运出中国,再作研究。为了不让王道士发现他的企图,他一方面加快了工作进度,一方面又假装对那些珍贵的文物显得漫不经心,无所谓的样子。果然,王道士再次上当受骗了。他把挑剩的文物搬回去,又从密室中把那些他珍视的汉文佛经之外的“杂物”,包括绘画和残篇断页等,一捆又一捆地搬来,并且准许斯坦因和蒋师爷把他们挑出来的文物留下来,作“更加深入的研究”。到了晚上,小屋里终于有一大堆被挑出来的文书和绘画留待运走。

但王道士能不能答应让他们运走呢?斯坦因并没有底,于是斯坦因和蒋师爷分别跟王道士作了长谈。他俩仍旧使用那个老花招,说玄奘让王道士发现佛经和圣物,其目的并不是让它们继续藏在密室里,而是应当让受玄奘在天之灵指引而来的斯坦因带走,以供西方学者进行研究,这是一件功德。作为交换,斯坦因和蒋师爷又反复重申要捐赠一笔钱用于洞窟和庙宇的修缮。但交谈中,还很难看出这些话到底对王道士起了什么作用。“他既担心他的圣洁名声因此而受到玷污,同时又不愿意放弃一个为他修缮庙宇的好机会,这对他衷心珍爱的功德事业很有利,但必须付出他所认为无用的那些古董为代价,看得出来,王道士一直都在上述两种选择之间犹犹豫豫举棋不定”。至于官府的就地封存并令他看守的命令,看来王道士并没怎么放在心上,反而由于政府的不重视与不付丝毫代价而愤懑不平。

到了半夜,蒋师爷提来一大捆卷子进了斯坦因的帐篷,这正是斯坦因在小屋里挑选出来的,王道士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但有一个明确的协定:此事只能他们三个人知道;搬运只能由蒋师爷进行;斯坦因离开中国以前,对这批东西出土的地点必须守口如瓶。一连七个晚